

目 录

解放战争时期武汉市委地下革命斗争概述	曾 悅	(1)
解放战争时期武汉工人斗争记	刘 实	(51)
武汉地下生活的八个月	郭治澄	(82)
武汉大学在解放前夕的应变斗争	关仲炎	(101)
从“和平运动”到武汉解放	喻育之	(111)
我在武昌金口起义的经过	张 秧	(134)
白崇禧在武汉解放前夕的阴谋活动	吴相和	(150)
解放前夕中共在武汉的内幕种种	徐 行	(156)
军统在武汉解放前夕的应变内幕	刘 非	(177)
“四大金刚”之一的自述		
——回忆在武汉“劫收”的前前后后	徐怒宇	(190)
老牡丹花和小牡丹花	陈伯华	(214)
汉口外国租界的产生和收回简述(附租界图)	杨 锋、龙从启	(223)
汉口景明大楼事件真象纪要	文史资料办公室整理	(250)
中国四大中药店之一的叶开泰	叶元同	(246)
小笼汤包“四季美”	田玉山	(253)
武汉沿革略识		(267)
附：征集文史资料参考题目		(274)

解放战争时期 武汉市委地下革命斗争概述

曾 悅

(一) 隐忍精于，长期埋伏，积蓄力量，抓得时机 (二) 开展了“第二条战线”的英勇斗争 (三) 反迁移，反破坏，保卫城市完整，为配合大军解放武汉而斗争——一、加强党的领导 北大革命组织 二、搞好宣传教育 初辟游击攻势 三、狠抓调查研究 布备胜利接管 四、接过“反攻”口号 反迁移反破坏 五、运用统战法宝 加强上层工作 六、执行政策威力 积极策反攻心 七、最紧张、最兴奋的时期来到了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党中央和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武汉地方党组织进行了艰苦的重建工作。

武汉（地下）市委的同志们，和中原局城工部、江汉军区城工部及其它系统的同志一道，坚决贯彻党的七大路线和党在华中的工作的十六字方针，紧密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配合人民解放军的战斗，使武汉这座大城市——我国历史上的名城，华中的政治、军事、经济重镇，完完整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三十一年过去，恰似弹指之间。而当年同志们为了推翻三座大山，建设新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英雄气概，以及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生死与共，团结战斗，不怕牺牲的生动情景，都历历如在眼前。

(一) 隐蔽精干 长期埋伏 积蓄力量 以待时机

经过我全民族坚持八年的艰苦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此时，中国仍然有成为一个新中国还是旧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长期躲在峨嵋山上“坐山观虎斗”的蒋介石，要于山来篡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人民坚决反对他的篡夺，针锋相对，寸权必夺，寸土必争。这就是民族矛盾解决之后，迅速上升起来的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斗争。

这种矛盾和斗争，在一些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表现得尤为突出。早在抗战胜利之前，党中央为着争取抗战的全部胜利，就提出了“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和抗战胜利后的形势，中共南方局从武汉地区工作的重要性和党的组织活动中断的情况出发，决定了派人到武汉去，重建党的组织，进行艰苦的开辟工作。当时的策略是：“国民党公开接管，我们地下接管。”

根据地下工作的需要，南方局组织都先后向武汉派出了几支力量，并且在初期互不接上关系，在地下进行平行的作业。

我原来是在湘鄂边等地工作的，后来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并且参加了党的“七大”。日本投降后，根据党关于加强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决定，我又由延安到重庆，由南方局分配任务。不久，南方局就决定了我为武汉开辟地下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并由钱瑛同志找我谈话。钱瑛同志说：“武汉地方很重要，影响到湖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和广州。国民党搞了三次反共高潮。过去那里受王明路线的影响，搞公开的党，损失很大。你遂

次去，一定要坚决贯彻党在白区工作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到一九四六年二月初的时候，钱瑛同志又对我说：“去武汉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有两批同志早已出发了。为你到武汉做准备工作的赵忍安夫妇和李声策同志，已经在武汉扎下了根。我已经去信通知赵忍安同志，说明你在不久就会到武汉去，你就准备动身吧。”于是，我辞别了南方局和钱大姐，离开了多年战斗的重庆山城，和王一南同志（我的爱人）、徐远同志一起，向着新的战斗目的地——武汉前进。

武汉，武汉，她是怎样的情况呢？她号称九省通衢，是全国水陆交通的枢纽。这里的人民具有革命的光荣传统。推翻封建王朝的著名的辛亥武昌起义，就是在这里发动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在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初期，这里都一度成为全国革命斗争的中心。一九三八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武汉以后，武汉人民受尽了惨无人道的杀害和折磨。好不容易盼来了抗战胜利的消息，武汉人民欣喜得热泪盈眶。可是不久，强烈的希望变成了强烈的失望。日本侵略者被赶走了，美国佬的军用吉普车却又在武汉的马路上横冲直闯。昨日骑在人民头上的汉奸、走狗，摇身一变又成了什么“守备军总指挥”、“地下工作人员”。那些“从天上飞来的”和“从地下冒出来的”国民党劫收大员们，把日寇从人民手中抢去的产业，又纷纷抢到他们手里去。他们只要“五子”（金子、房子、车子、女子、票子）登科，那里还管人民的死活。那时武汉的工业凋蔽，四大纱厂只有一家开了工，几十家化工厂也只有几家生产，汉口失业的产业工人竟达到全部产业工人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通货恶性膨胀，物价更是成百倍、成千倍地往上飞涨。人民到处咒骂：“盼中央、想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国民党为了镇压人民的不满和反抗，在平津、淞沪、武汉三地设立了一个“警备总司令部”，可以指挥作战部队，行使“缓

靖”的权力。军阀林立，特务横行，人民又生活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中。

这就是抗战胜利后的武汉。这就是地下党员们一九四五年底和一九四六年初到来时的武汉。

来的同志怎么办？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首先要找到职业，取得合法身份，十分注意隐蔽，和群众交朋友；把根子深深地扎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在初期的活动中，可以从群众迫切关心的生活问题入手，然后在斗争中继续进行教育，把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一步一步地提高起来。用钱大姐的话来说，这叫做“从生活到政治，从分散到集中”。

所有到武汉来的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十六字”方针和南方局的指示，首先都经历了一个艰苦的找职业，交朋友的扎根阶段。

这次派来武汉较早的一个地下党员赵忍安同志，原来在重庆时的社会职业是和成银行襄理。抗战胜利以后，和成银行的总经理吴晋航想另在上海、广州、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开设分行。赵忍安同志依据南方局的指示，从吴晋航那里争取到了去汉口设立分行的任务。于是，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他是西服革履，带着夫人，以汉口和成银行经理的大亨身份来到武汉的。他的任务是先行一步，在武汉设立地下党领导机关的交通站，并且利用吴晋航的关系同国民党的上层人物打交道，在工商金融界开展工作。他的这种身份，为后来的工作，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再一个来得较早的同志是李声策。他是李汉俊的儿子，李书城的侄儿。钱大姐交给他的任务，也是为地下党领导机关建立交通站。李书城当时是地方元老派的代表人物，任湖北通志馆的馆长。通过李声策与李书城的叔侄关系，建立了地下党与李书城的联系。

我到武汉来时，首先就找到李声策与赵忍安，李声策介绍我同李书城认识后，李书城同意我住在他的随从周辉林家里。但是一开始我还沒有找到社会职业。正好这时震寰纱厂的老板找和成银行借一笔款，赵忍安就乘机把我介绍到震寰纱厂去当了个技术员。为了不致于暴露个人的真实身份，地下工作者都要干什么像什么，我不得不买了些技术书，临时抱佛脚，照葫芦画瓢。有次厂方要我设计一座转梯，我到书店买些土木建筑的书来看，并向老木工汤师傅请教，画出图来。说来好笑，后来照我设计做的那个梯子居然还不错，群众还把我叫个“工程师”。我在震寰纱厂一直呆了大半年，后来由于许多地下党员陆续来汉，我还呆在武昌下新河的纱厂里，指挥工作就不大方便了。根据南方局的指示，我离开了纱厂的工作，又由赵忍安介绍我给一家私人钱庄做文牍工作，钱庄老板看我文字写得还好，工作又尽职，以后干脆把他的私人函件、业务秘密也统统交给我处理。这一下又把我难住了，因为每天的工作时间长，不便于开展党的活动。我要求辞去这个职务，老板以为我嫌钱赚少了，表示增加我的薪水，始终不答应我辞职的要求。后来还是赵忍安找这个老板，说我家乡有急事要办，才勉强放我走掉。最后由以商人面貌出现的施光秀同志掩护我，住在汉口汉剧院斜对面，一直到一九四八年初，我才能全副精力投入党的工作。一九四九年初，地下党文化新闻工作组郭治源、董式一等同志办起了《华中经济通讯社》，给我搞了一张空头聘书、一枚证章做掩护，我才进一步实现了“狡兔三窟”——即有住宅、办公地点和后备机关。

在基层工厂中扎根的是刘实、邓祥、张维明等同志带来的一批关系，起初有二十几个人。刘实等三人是地下党员，其余的如蔡杰、侯杰、李平等是国民党时跟随党多年的“工人民主工作队”的同志和一批在重庆民主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群众积极分子。

他们原属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于一九四五年底和一九四六年初相继来汉。他们通过武汉工商界进步人士陈经畲的儿子陈元直的关系，先到“义顺油行”炼桐油、修锅炉、做包活。初步站住脚以后，再通过其它的许多关系到武汉各工厂找活干。他们的工作十分积极，生活十分艰苦。比如刘实，白天要到处跑，联络人，了解情况，晚上回来还要弯着腰干完车工的活，干完活后还要学习、看书报。韩伯郎等人晚上还要刻写《中原青年》、《工人的话》等报刊，秘密印发。他们要工作，要自己作饭，晚上没地方睡，就开地铺。除了自己解决生活问题以外，还要从包工费中抽出钱来交给党作活动经费。他们中的杨福潮同志，是个特级技工，到大冶电厂当了汽轮机房的领班，又把张维明介绍进了大冶电厂，和在华钢做工的熊庭华一起，组成三人战斗小组，在黄石开展工作。

再一支力量，就是陈克东带来的那批人，如施光秀、吴俊义、朱康侯等同志。他们原来直属南方局组织部领导，也是一九四五年底和一九四六年初由重庆等地陆续来的。这批同志大部是湖北人，原来就在湖北工作，对湖北的地区较熟悉，与各方面的联系也很多。他们以做买卖和跑单帮为职业掩护，主要任务是搞交通联络和为地下党筹集活动经费。到解放区的交通线，就基本上是他们建立起来的。他们做过工人的工作，也做过农村的开辟工作，也做过学生的工作。到后来，陈克东和汪德昭、吴明勋等同志，还做了大量的策反工作，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此外，还有负责统战工作的史林峰同志，一九四六年到武汉以后，开始时安排他在民生路清真寺的夜校补习班里当教员。史林峰同志不会教英语，又把从西南联大来的李循蒙同志派去顶替他。然后通过进步人士刘佛、李寿慈等人的关系，把史介绍到善后救济总署湖北分署去当了资料员。还有抗战期间就在四川乐山

任中心县委书记的罗明同志，也在武汉中学找到了教员的社会职业。还有抗战期间从外地转到武汉来的王维璋同志，接上关系后也在群众中开展了工作。还有在联营书店工作的欧阳章和马仲扬等同志，他们在汉口号称《文化街》的交通路上，勇敢而又机智地供应莫斯科出版的《联共（布）党史》、《列宁主义问题》、《丹娘》等书籍，供应重庆《新华日报》出版的毛主席著作，供应香港出版的《群众》和上海出版的《文萃》杂志，在读者群众中暗地里传播革命火种。通过这些活动，他们不仅联系了像《演剧四队》、《演剧六队》等一类的进步团体，联系了许多倾向进步的记者、职员、工人和师生，并且在一九四六年六月蒋军围攻我中原军区后，还转送了三、四批由湖北宣化店突围出来的我军政人员。

这里还要简述来自西北师范学院的两个大学生。一个是女的，叫张瑾格，河南人，她父亲是个大学教授。起初，张瑾格在联营书店当店员。后来她读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以后，一心想直接地投身到工农兵当中去，与工农兵相结合。但解放区又一时进不去，这样才在武汉接上了关系。为了在女工中开展工作，刘实同志派她到一纱厂去当工人。交给她三个任务，一是学技术；二是学湖北话；三是和工人交朋友。一个教家庭出身的女大学生，过去养尊处优，此时要学会纺纱技术，每天劳动十几个小时，还要做群众工作，到最后硬是把身体都累垮了。她刻苦地向群众学习武汉语言，很快地学到了一口流利的武汉话，而且是工人的话，她满腔热情地在群众中活动，先和女工李菊英交了朋友。后来又通过李菊英的选择和女工万秀英交上朋友。她们利用旧的形式，搞姐妹会，团结女工，和头佬斗，发动罢工。经过考验，后来她们三人同时成为了地下党员。

再一个是男的，名叫刘绵，出身于官宦之家。他通过国民党军

事委员会武汉行辕副主任孙蔚如的关系，到武汉行辕当上了内总收发，和中尉机要课员。凡有上报下达的公文和机密要件发出，都要经过他那里收发、校对，然后盖上行辕的大印，他因此能及时得知许多极为重要的机密。像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国民党进犯我中原解放区，在敌人行动前的许多天，刘绵就在行辕得到了有关兵力部署、作战方案的绝密文件。他表面上若无其事，心里面急如火焚，经过抄录后迅速地送交了地下党。党派人把情报秘密地送给了当时在汉口美国新闻处工作的陈枫，再经陈枫暗中传给了当时在武汉的三人军调小组的我方翻译马寒冰，马立即交给了我方代表吴德峰等人，通知了我解放区。还有敌人呈送武汉行辕决定逮捕我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的黑名单，在逮捕令校对、盖印之前，刘绵也记了下来即时报告地下党组织，党组织迅速地布置这些同志提前转移了。

就这样，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党从各方面派到武汉来的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都在各处找到了社会职业，有饭吃，有合法身份，有了立脚之处。从分布的情况来看，铁路交通、邮电、水厂、电厂、纺织、军工、学校、工商、金融、以及政府机关、军、警、法院、税局等等部门都有了我们地下党的同志。这些同志从群众在政治上、生活上、文化上的情况出发，做个别的、深入的、扎实的交朋友的工作，从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壮大进步力量。有些工厂、学校的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还从群众最关心的生活问题入手，发动群众揭露了资本家、封建把头、校方以至地方当局压迫群众、剥削群众的罪恶，打击了他们的反动气焰，使群众看到自己的力量。这些工作，都为下一步的斗争打下了基础。许多在这一阶段发现和培养的积极分子，在下一阶段的斗争中成为群众中的骨干人物，有的成为战斗力很强的新党员和群众领袖。

(二) 开展了“第二条战线”的英勇斗争

到一九四七年初，有关地下党前段在武汉扎根的情况，陈克东、刘实和我都曾向钱瑛、刘宁一同志作过汇报。

这时，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蒋介石进犯解放区的军队，在许多地方都打了败仗。另一方面，由于蒋介石政府长期推行反动的财政经济政策，加上大搞卖我国主权的《中美商约》的签订，使得恶性的通货膨胀更加猖獗，物价更加疯狂上升。以抗战前夕的物价为标准，一百元的人民币在一九三九年还可以买到两头牛，到一九四五年下降得只能买到两个鸡蛋，到一九四六年更只能买到六分之一块肥皂了。武大的校长周鲠生在一九四七年一月报告学校经费困难时就说：政府拨给武大的全部经费每月一千一百万元，而学校电费支出一项就要一千四百万元，全部经费拿出来也不够水电之用，更谈不上其它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运动迅速发展起来。由于国民党压迫上海摊贩（枪杀十多人，打伤百余人，逮捕近千人）而引起的上海市民骚动，和由于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而引起的北平学生运动，标志着蒋管区人民斗争的新高潮。由北平开始的学生运动，迅速发展到几十个大中城市的几十万学生罢课，举行反美反蒋示威游行，其规模超过了“一二·九”抗日学生运动的程度。

根据全国革命形势的变化和武汉地下斗争发展的情况，钱瑛同志和刘宁一同志说，去武汉的同志都已经扎下根来，可以将他们联系起来了。他们指示：武汉地下党的同志马上行动起来，

极领导武汉地区的爱国民主运动，积极配合全国开展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正义斗争。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党从各个方面派到武汉来的力量开始汇合起来。首先是我和陈克东同志在吴邦彦同志家里碰了头。三月份，党在上海的办事处撤退以后，黎澍同志带来了刘实秋、胡才等同志的关系。以后，其它的一些关系也陆续交来了。对武汉地区当时的形势和力量状况，我们共同研究决定：积极发展组织的活动，在组织群众斗争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经过集体研究，我们还确定，把工作的重点首先放在学生方面。

当时，武汉地区的学生活动是很突出的。头一年，武汉大学师生为要求补发从乐山迁回武汉的复员费和改善校政，曾举行罢课，斗争达两个月。北平发生美军强奸中国女学生的事件以后，武汉地区的大中学生义愤填膺，当即联合起来，举行了游行示威，抗议美军的罪行，并且强烈要求美军滚出中国去。接着，又举行了“五四”罢课和声援南京、天津“五·二〇血案”的游行。五月二十二日，当示威游行的几千学生队伍准备渡江的时候，发现国民党政府预先封了江，上下连一支小船也没有。学生们一怒之下，高喊着“找省政府去！”“找方耀庭去！”一气冲进了伪湖北省政府。省府的头目们躲起来不与学生接触。学生们气得无法，就拿起笔来，在办公室到处写上了“反对内战”、“打倒独裁！”“内战不止，人民饿死，没有人民，哪有政府？”和“官肥民瘦”、“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等标语，撕毁了部分办公室。

为了加强对武汉学生运动的领导，地下党的派出很多同志，通过各种关系，与武汉大学、华中大学、中华大学、艺专、警官学校等大专院校的进步学生建立联系，其中以武汉大学为重点。

武大具有优良的革命传统。早在大革命时期，这里就有了党的支部。在抗战期间，大约发展了二十多名党员，后来都离开了学校。到一九四六年学校由乐山迁回武汉时，只留下两名地下党员做种子。当时这两名党员的关系，还在钱瑛同志手里没有交清来。我先是派徐远同志（当时化名李子园）到武大去。徐远通过张师韩同志的介绍，与武大的进步社团《文藻社》的负责人夏雨亭建立了联系。接着刘实同志在武大找到了他过去的同学贾道健。刘绵也在武大找到了她的同乡袁寿宽。通过这些在群众中有影响的进步学生，地下党随时了解到武大学生运动的发展情况，并且对他们的活动提出建议。

这时，党中央已经发出《关于在国民党统治区斗争策略指示》，指出蒋介石在前线大败，后方危机重重和莫斯科会议解决国际问题的情况下，在其统治城市，大施镇压，赶走我方人员，威胁民主运动，捕打人民学生。针对蒋的镇压政策，我们应扩大宣传，尽情揭露其反动设施和阴谋活动；但是在行动上应避免在不利条件下硬碰。要善于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蒋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在工人与城市贫民中，更应着重领导与发展。

因此，当北平学联提出六月二日举行全国总罢课的计划后，我们十分注意各方面的动向，并且从宋书城、张准先等人物那里得知反动派的情况有些异常。“六一”惨案发生后，徐远在武大就促夏雨亭说：“从我们各方面得到的消息，国民党这次很可能下手，我们的意见最好是改期举行。”夏雨亭马上把这个意思告诉了地下党员王尔杰同志。他们商量后认为，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要改变计划已经来不及了，但总体考虑了我们的意见，对第一线的积极分子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

果然不出所料，凶残的敌人经过一番紧张的策划，一场大逮捕大屠杀的阴谋定了下来。国民党为了破坏镇压总罢课，于六月一日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等城市进行了全国性的大逮捕。这一天，各地被捕的学生、教员、记者、市民等至少有二千多人。在武汉，以蒋介石的嫡系彭善为头目的伪武汉警备司令部，召开了军警宪特秘密会议。五月二十八日审定了捕入的黑名单。五月三十一日晚部署具体行动，一股人到华中大学，一股人到武大。六月日凌晨三时左右，几千名全副武装的军警宪特冲进了珞珈山，包围了整个学生宿舍，宿舍内部的每条走廊都严禁学生走动，然后由拿着武器和黑名单的军警宪特，在校内戴着面罩的特务的导引下，在一片“不许动！”“不许动！”的叫喊声中，强行绑走了大批无辜的学生。教授住宅区也是鬼蜮横行，抓走了梁国东、缪朗山、金克木、刘颖、朱君允五位男女教授。同学们眼看着一辆辆装满被捆绑的同学的卡车开走，眼眦胆裂。他们实在忍受不住了，他们和军警展开了勇敢的搏斗。机械系的同学钻到汽车前面，掀起车盖，破坏了电路和油路。有的同学用拳头砸碎车窗，鲜血直流，染红了玻璃。有的勇猛地跃上汽车，把自己的兄弟背下来。就在这时，有个反动军官拔出手枪一放，发出了大屠杀的讯号。于是早已在宿舍各处埋伏的军警宪特，向学生们开动了手枪、步枪、机关枪，投掷手榴弹，顿时珞珈山学府变成了屠夫们的杀场。尤其令人愤慨的是，为了屠杀无辜学生，他们竟然用了国际协定上禁用的达姆弹。结果，黄鸣岗、陈如丰、王志德三位同学被打死，无数的同学被打伤。再加上五位教授、三位工友和十四位同学被捕。就这样，蒋介石反动政府又在武汉制造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六·一”大惨案。

也就在武大《六·一》惨案的同一天，几十个端着冲锋枪的宪警，砸开了武汉联营书店，逮捕了马仲扬、金思明、尤开元、王

仁林、李行方、宋禾六个主要工作人员。

“六一惨案”发生的当天，我们就知道了消息，徐远、刘实、陈克东、刘绵等同志马上就赶到武大去了。这时，国民党封锁了去武大的交通，封锁了新闻，严令各报社、通讯社不许擅自刊登新闻报道，只许发伪中央社一家颠倒黑白的造谣新闻。党经过了解情况以后，提出了如何进行斗争的六条意见，派王一南同志当交通进行传达。为了突破敌人对武大的封锁，王一南同志怀着六个月的身孕，徒步去武昌找到李声簇，把党的六条意见带到武大。当晚，地下党员王尔杰、赵萌兰和夏雨亭等人就进行了研究，决定从各社团中抽出一名骨干建立秘密的临时机构，并研究了公开成立“六一惨案”处理委员会，派出赴京请愿团，以及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严惩凶手，撤查程潜，立即释放被捕师生，公葬死难同学，抚恤死难者家属，赔偿学校一切损失，保证今后不许军警宪特进入学校非法捕人等一系列问题。目的是打破封锁，冲出学校，向各界揭露惨案真象，争取社会声援，把目标直接指向反动统治者，以便通过这一事件，把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推向更大的高潮。

经过发动全校师生员工向家属亲友写信报告惨案真象，向各大、中学校分批派人报告惨案经过，通过当时在武汉美国新闻处工作的进步诗人邹荻帆，用美国新闻处大信封把“六一惨案”纪实、控诉书和血案照片寄往上海，由懂得世界语的邵利华同学，把“六一惨案”纪实等材料的译文寄往捷克世界语学会，惨案的消息很快传到各地去了。一队队来吊唁的人群，一封封来吊唁的慰问信、声援信，从四面八方向武汉大学涌来。华北学联还发表了宣言，号召各校总罢课一天，并设祭坛向烈士英灵祭奠。

也就在这时候，我到上海向钱瑛同志汇报工作，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六一惨案”的情况。

为了进一步加强地下党在武大的工作，钱瑛同志把早已隐蔽在武大的两个学生党员——王尔杰、赵萌兰的关系交给了我，同意我们在武大发展组织。我回武汉以后，立即叫陈克东去找王尔杰接上了关系；并且当天就在李循蒙同志的家里成立了学运组，由陈克东、李循蒙和王尔杰三人负责。地下党紧张地研究了发动各界人士参加六月二十二日在武大召开追悼大会，举行抬棺大游行的问题。还决定在校外由陈枫夫妇刻印进步刊物《方向》。~~短短~~两天之内，党就从各方面发动了一批批工人、工商金融界人士、~~群~~民和郊区农民，送去了大批的挽联。

到六月二十三日，地下党又广泛发动各阶层群众，迎接和参加武大学生为死难烈士举行的出殡大游行。

在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面前，敌人搞的十分被动。到最后，他们不得不被迫释放了被捕师生，宣布将伪警备司令彭善撤职查办，拘捕伪稽查处长胡孝扬，并且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与释放武大被捕师生的前后，经过地下党组织和三联书店负责人黄洛峰、书业界张静庐等先生的多方营救，联营书店经理马仲扬等六同志，也从“军人监狱”里获释。

“六一惨案”彻底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腐朽和软弱，也给许多幻想走“中间道路”的人以深刻教育，使他们认识到了反动派的本质，懂得了“改良”的道路行不通。

“六一惨案”是武汉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群众运动发展的一个新起点。经过这次斗争的锻炼，不仅使武汉的学生运动走上了更广阔更深入的发展阶段，党的力量在学校中有了发展，而且武汉的工人运动和其他战线的群众运动，也日益迅猛地开展起来。

武大经过前段运动，到八、九月后，党发展了第一批党员，像崔明三、王云从、王伯谦等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和骨干都吸收进

来了。十月，经地下党批准，建立了党支部，在武大校史上写上了新的一页。往后，武大的党组织有了更大的发展，建立了党总支，由吴仲炎同志任书记。教师中也发展了蔡心祖同志入党。到后来，党员发展到八十多人，成为党员最多的一个战斗堡垒。

与此同时，武汉其它大学的学生运动，也有了迅速的发展。

如华中大学，原来是个教会大学，思想控制很严。早先只有少数进步学生，如刘维纓、叶士豪、罗际荣等，秘密组织起“共产主义促进会”。后来随着抗议美军暴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声援“六一惨案”武大受难同学等活动，逐步打破了校内死水一潭的局面，出现了“苍海文汇社”、“友联社”一类政治倾向较明显的文艺社团。到后来这种情况已不能与发展的形势相适应，于是出现了“啦啦合唱团”一类的更为活跃的社团。华大过去有过唱“弥赛亚”的圣诗团体。“啦啦合唱团”出现以后，连过去专唱圣诗的同学也对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和一些刚健清新的民歌，以及“古怪歌”一类讽刺性歌曲感兴趣而参加进来，群众性更为广泛了。

中学的运动也活跃起来了。一些爱好文艺和倾向进步的学生，如饥似渴地阅读鲁迅的著作、高尔基的《母亲》、茅盾的《腐蚀》等作品，同时举办壁报，写诗歌、散文，有的并揭露黑暗面，或零星地反映一些学运的情况。接着，“读书会”的形式在一男中、二男中、一女中、武汉中学、首义中学、高商、大公中学、汉阳高中等学校发展起来。徐晓钟、舒学焜等中学生还发起组织了《武汉学联剧团》。剧团的成员以后发展到遍及许多学校。市一男中学生张兆贺（现名张梦林）与地下党员、女教师陈梅影联系上以后，积极开展了组织活动。他原先听人说可以组织“共产主义读书会”，陈梅影叫他小心上当，注意“红旗狗”。他接受了这个意见，只搞“读书会”。陈将他的关系交给地下党文化

新闻组杜子才、童式一领导，童叫他以“武汉学联地下工作组”（简称“学工组”）名义进行活动。他在各校读书会的基础上，发展了许多学工组的成员，团结教育广大同学，打击学校当局中少数顽固分子，积极参与社会上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他还参加到“学联剧团”中去，当了剧团的研究股长，审查和推荐剧目。剧团先后排练和公演了爱国抗日的话剧《万世师表》（张骏祥编剧）、和反封建的话剧《金玉满堂》（沈浮编剧）等剧目，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此后，学生运动一直不断地向前发展。八月，为了团结起来，自谋生存，武大、中华大学、农学院、艺专、省立二中、汉阳高中和武汉学生联合剧团等单位，还共同发起了组织《武汉清寒学生助学运动筹备处》，并且招待武汉新闻界，报告助学意义。这一运动得到了广泛的响应。许多学校都积极参加助学活动，他们组织了劝募队、义卖队、歌咏队，到街头、轮渡码头、影剧院去募捐，散发《为助学告社会人士书》。义卖的商品有助学章、助学广告、糖果、饼干、冰棒、香烟、书报刊物和劳力——在街头帮人擦皮鞋等等。这些活动，不仅对清寒学生进行了经济和物质上的帮助，而且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镇压剥削人民的罪恶是个深刻的控诉和揭露，对广大学生和市民也是个很生动的教育。

到一九四七年秋，武汉的形势出现了新局面。刘、邓大军强渡黄河之后，千里跃进，直插大别山，逼近武汉。人民解放军跳到外线作战，在武汉产生了很大影响。敌人十分惊惶，人民极为振奋。加上这时物价更加恶性上涨，群众连起码的生活都难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武汉的砖瓦业工人、木工工人、纸盒工人、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纺织工人等二十几个行业的工人，都曾为反对压迫、反对裁减工人、要求提高工资，进行了怠工、罢工